

# 央企年均工资为私企 4.2 倍 专家称收入改革仅治标

网易财经发布了《2011 年中国央企工资报告》，报告称对国内 117 家央企及其上市子公司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进行整理后发现，2011 年央企及其上市子公司在职工平均工资为 102965 元，对比当年城镇私营单位在职工年平均工资 24556 元，央企在职工平均工资高达后者的 4.2 倍。而城镇非私营单位在职工年平均工资为 42452 元。

## 对策 收入改革治标 打破垄断治本

针对收入差距日益加剧的现象，记者了解到，酝酿 8 年之久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将于今年年底出台。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认为不能对此期望过高，仅凭一个方案不可能解决收入分配中的所有问题。杨志勇认为收入分配改革更重要的是重视收入流通渠道，即人们的收入跟自己纵向相比能否增加，如 5 年后的收入是否比现在高，但据了解，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中并没有对收入流通渠道作出规定。

“之前国家也发布了很多指导价、最低工资标准等，年底的《方案》应该还是一个改良，这些都是国家给的一

个限制。但总的来说，较大的垄断行业主要靠国家宏观调控。”韩兆洲认为，若要遏制央企收入巨幅增长，就要引进竞争机制，在国家宏观调控之外，加以适度的竞争。“对较大的垄断企业进行调控的主要目的是成本核算和利润控制，对较小的央企就可以放在市场中解决。”

林江表示，解决收入差距的根本之道在于打破垄断。比如像油品企业，可以让民营企业、民间机构都一起参与从事油品的生产，甚至参与到挖油、炼油等项目中；电讯业、银行业等也可以引入民间资本一起开发。“如果暂时做不到，最低工资指导线也要更明确、具体一点，否则央企职工的工资还是会继续涨，收入差距也会继续加大。”

## 现象 行业差距拉大 金融业年均工资高达 26 万

“政府规定的企业工资指导线实际很难执行，也就是所谓封顶很难实现。”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林江认为，员工的平均工资定义很宽泛，包括名义工资、实际工资、岗位工资、补贴工资等，如果工资指导线要求封顶的是岗位工资，企业可以让岗位工资符合标准，但其他工资不封



顶，这样一来既符合了标准，职工工资却仍然很高。因此若定义不同，实际执行中很难达到指导工资的预期目的。

除了和社会整体行业之间有差距，根据报告，不同行业的央企职工年均工资也有差距，其中差距最大的是建筑业，最小的是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而从收入看，平均工资最高的是金融业，高达 26 万多，最低是农林牧渔业，为 7 万多，不到金融业的三分之一。最富有的招商银行员工平均工资收入近 48 万，不仅位居银行业第一，

也在央企所涉及的行业中独占鳌头，而最贫穷的葫芦岛铝业员工收入仅 2 万多，不及招行员工的零头。

另一方面，央企所涉及的行业并非都是垄断业，多数行业仍属于竞争性行业。在国资委研究中心竞争力研究部部长许保利看来，竞争性行业高工资和企业自身经营相关，企业经营好盈利多，会向员工提供较高薪酬，这无可厚非。由于垄断部门对产品没有定价权，其产品价格由发改委规定，发改委对垄断产品的价格管制，导致垄断行业暴利以及随之而来的

职工高工资。因此对于央企的高工资也应区别来看。

## 区域不平衡 在广东的央企年均工资最高

报告显示，央企及其上市子公司员工年平均工资在区域分布上也不平衡，其中，广东央企的员工年平均工资最高，为 219917 元；其次是天津，员工年平均工资为 175287 元；最低的是云南，员工年平均工资为 46424 元。即使区域内员工的平均工资也有差别。

“首先，从外部条件来说，广东地区经济总量全国最高，而从行业上看，央企很多都是垄断企业，本身是垄断行业又在经济发达地区，那它的经济效益当然更好。”韩兆洲表示。

对此，林江举例作答。“像中石油中石化，因为广东的经济总量大，再加上它们是垄断企业，广东车主对于油品的需求跟北方城市相比会大一些，那么企业针对这些需求要提供更多的服务，那它们在广东赚取高利润的概率就比北方各大城市要大得多。”

林江认为，这归根结底是经济发

展的问题，职工工资是和企业受益挂钩的。（摘自《南方日报》文/刘耀）



## “中国制造”走向顶级品牌

“中国制造”曾被视为廉价和伪劣产品。但如今，这种声音越来越罕见。许多中国企业注重质量，并立志在全球创建顶级标签。这个伟大的国家越来越自信。

“并非所有来自中国的产品都是垃圾”，法国摄影师德里马斯曾在北京工作 6 年，在那里他见过许多中国制造的高品质和独特产品。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这些，他创办了网络杂志“很好的中国制造”，无论是竹家具，还是连帽衫或地毯，都会展示一个元素——“中国制造”。

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向西方企业开放时，“中国制造”还是大批量、低成本、低质量的代名词。随着经济突飞猛进，“中国制造”如今已与创新、独特和细节处理联系在一起。不管是小的手工作坊，还是大规模的企业，都在创建自己的品牌。越来越多中国人为本国产品而自豪。

麦肯锡咨询公司估计，到 2020 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将翻番。这个日益富裕的国家对生活质量提出更高要求。中国中产阶层已超过 4000 万，西方公司看重他们，中国公司也盯上这些人。

在中国，产品质量已成为新焦点。德国普福尔茨海姆大学国际商业教授弗特西认为，中国消费者已学会欣赏产品的质量。这是一个学习过程。越来越多消费者看重高质量的国货，“许多中国人买第一套房子时都会安装便宜的水龙头，但第二套时他们不会这样做了。”

更多中国企业正走向国际市场，既为吸引海外客户，也是面向本土客户，想令产品更具吸引力。李宁的体育用品已在伦敦和巴黎开设专卖店，其竞争对手耐克则在美国开设专卖店。

北京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但并非所有行业。中国行事很小心。比如，越来越多的中国货车销售到乌兹别克斯坦、埃及和斯里兰卡。但中国车商还在等待时机，等质量进一步提高时再进入要求更高的欧洲市场。（摘自《国际在线》）

# 美国领衔全球大旱 新一轮粮食危机逼近



## 未来 20 年 城市将接纳 5 亿农民 需要 40 万亿成本

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发布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2)》。蓝皮书指出，今后 20 年内，中国将有近 5 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为此至少需要 40 万亿-50 万亿元的成本。

蓝皮书指出，从乡村型社会向城市型社会转型是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如果未来中国的城镇化率以每年 0.8-1.0 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到 2020 年前后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超过 60%。这同时意味着，今后 20 年内，中国将有 2 亿多农民需要转移到城镇就业和居住，再加上近年来已经进入城镇但还没有完全市民化的农民，未来全国将有 4 亿-5 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

据初步测算，仅解决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农民市民化成本至少人均 10 万元。在未来 20 年内，至少需要支付 40 万亿-50 万亿元的成本。

中国社科院城环所副所长魏后凯研究员表示，目前中国离城市型社会的要求还具有较大的差距。从生活方式标准看，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郊区就地转化的农转非居民以及县改区中存在的大量农民，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其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仍然保留着农民的习惯和特征，市民化程度低。

蓝皮书还显示，2011 年，中国城镇人口达到 6.91 亿，城镇化率达到 51.27%，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了农村常住人口。人口城镇化率超过 50%，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表明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市时代。（摘自《京华时报》文/张然）

作为世界头号农产品出口国，美国正遭遇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旱灾。近日，为缓解灾情对农民的影响，确保本国的粮食安全，美国联邦政府接连出台措施。

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多国旱灾引发的国际粮价上涨，使全球出现新一轮粮食危机的风险大增，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法国和美国就在研究召开粮食安全高级别会议。

## 1.7 亿美元大单

当地时间 8 月 13 日，奥巴马总统宣布，美国农业部(USDA)将动用一项紧急援助基金，采购价值 1.7 亿美元的农产品。此举旨在帮助农民和畜牧生产者抵御冲击，平抑食品价格，稳定市场。

在这张 1.7 亿美元的采购清单中，包括 1 亿美元的猪肉、5000 万美元的羊肉，以及鸡肉和鱼肉各 1000 万美元。

美国农业部长蒂姆·维尔萨克(Tim Vilsack)表示，购买的农产品将被送往以食品银行为代表的“食物营养协助”(food nutrition assistance)项目，储存下来在需要的时候分发出去。

同时，奥巴马还极力呼吁国防部鼓励其供应商加速采购计划，表示应“趁现在价格还不高”出手，并且建议国防部官员将采购来的肉类产品冷冻后以备不时之需。

目前，政府已对受灾的农牧场主提供低息的紧急贷款，开放了多片联邦土地用于畜牧业发展，并且拨款 3000 万美元缓解牲畜的饮水危机。

鉴于旱情经久不退，由此引发的农业危机已经成为了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关键议题。奥巴马此前曾欲推动国会通过一项有益于农民的农业法案，但最终还是因共和党人以成本过高为由作罢。

而此次价值 1.7 亿美元的大单就是奥巴马在视察艾奥瓦州前宣布的。艾奥瓦州号称“美国粮仓”，是历届大选中著名的摇摆州。该州是此次

大旱的重灾区之一，玉米产量锐减令美国的玉米价格创历史新高。因此，奥巴马也迫切希望能借此次出访在 11 月 6 日的选举中顺利拿下该州。

## 粮食危机逼近

8 月初，美国农业部再度追加 12 个州的 218 个县为干旱受灾区。截至目前，在美国的 50 个州中，已有 32 个州的 1584 个县成为受灾区，其中的 1452 个县都是干旱的直接受灾区。这表明，美国这场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大旱蔓延范围在不断扩大。

此次大旱来袭，正值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因此玉米成为了受大旱影响最深的农作物。农业部官员表示，面对因大旱导致利润微薄的现状，不少农民提前收割，放弃了大片玉米种植地，面积甚至超过比利时与卢森堡的国土面积总和。

除玉米歉收之外，干旱还严重影响了美国的牧场，导致牧草质量低下，因此牧民不得不提前宰杀以牧草为食的牛群，此举推高了美国肉类食品的价格。农业部还降低了大豆、鸡蛋、奶类与猪肉产量的预期。

联合国上周发布报告称，7 月，世界食品价格上升 6%，其中玉米价格变化最为显著。由于美国是世界最

大的玉米出口国，其玉米出口总量占全世界出口的一半，因此，深受大旱影响，玉米价格在最近三个月的时间内飙升了 23%。

世界银行日前也发出警告，美国、俄罗斯、印度等主要产粮国的旱情已在推动国际粮价上涨，将威胁到世界贫困人口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甚至导致社会动荡。

鉴于美国旱情近期缓解无望，联合国在报告中警告道，若世界各国应对乏力，不排除会再度爆发类似于 2008 年的全球粮食危机。

4 年前，由于粮食歉收和管理不善，加上一些国家粮食政策失误，全球首次发生 30 年来的粮食危机，数百万人的生命和生计受到威胁，12 个国家发生暴乱。虽然当前的高位粮价在整体上还不至于导致 2008 年那样的粮食危机，但仍不可掉以轻心。

法国农业部发表新闻公报说，法国和美国正密切关注全球粮食价格变动，将在全球粮食安全问题上加剧的情况下在二十国集团框架内召集农业市场信息体系快速反应论坛，讨论粮食安全，寻求共同对策。

（摘自《第一财经日报》）

# 多投资还是多减税？

近期有两则新闻颇引人关注。一是国务院常务会议宣布企业税收“营改增”将从上海一地试点扩大至北京、天津、江苏等 10 个省市，而且明年将继续扩大试点规模。

二是长沙今年规划了 195 个项目，总投资 8300 亿元，而长沙去年的 GDP 总额为 5700 亿元。即便这些投资将发生在未来五年，其规模也相当惊人。

在目前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和稳增长措施加快推出的背景下，这两则新闻反映了政府在财政政策方面面临的两个选择：一是公共投资，二是减税。笔者认为，当前应该避免再次采用类似 2008 年至 2009 年以政府投资为主的财政政策，而应该顺势加快财税制度改革、加大减税力度、鼓励开放私人部门投资。

上一次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虽然有助于中国经济迅速走出全球经济危机的阴霾，也加深了中国经济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如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国进民退”和楼市泡沫风险的聚集。在当前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情况下，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的平衡再次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重大难题。当前经济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企

业利润大幅下滑、投资意愿低，并由此导致内需的低迷。加大公共投资可以有效地在短期内恢复内需增长，而减税可以提高企业的利润率并恢复企业投资的信心。问题的关键在于政策重心的选择。

从短期而言，两种政策均有助于中国经济稳增长。就中长期而言，减税和鼓励私人部门投资无疑是更优的选择，可以兼顾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目标。加大公共部门投资的好处在于政策的直接性和有效性。但这面临两个挑战。

一是如何控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避免重蹈财政过度借贷(包括以地方融资平台等各种形式的覆辙。长沙出台的大规模投资计划只是一个例子。据报道，贵州提出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总额在 3 万亿元左右。这对于贵州省 2011 年的 GDP 总量(5700 亿元)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3940 亿元)而言，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很难想象这些规划是在严谨的可行性分析后提出的。

二是融资问题。中国经济最近几年高速发展的过程主要是靠房地产与投资两条腿走路。具体而言，房价

上升伴随着地价上涨。这一方面提高了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益；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以土地做担保，通过融资平台的模式可以从银行体系得到更多贷款。这使地方政府有财力投资建设当地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经济的成长反过来进一步推高了房价和地价，拉动了房地产和相关行业。

如何在保持楼市调控的同时加大公共投资，成为决策者目前面临的一个大难题。随着楼市调控深化，今年上半年土地出让面积较去年同期下降了约 20%，财政收入增速也大幅放缓。如果仍然以加大公共投资为重点，融资压力将导致中央和地方之间在房地产政策方面加强博弈，倒逼楼市调控放松。最近一两个月楼市出现的回暖迹象，就显示了市场预期到可能会出现这一局面。

相比之下，降低企业的税负，鼓励私人部门投资，对中长期提高投资效率和改善经济结构更加有效。首先，通过减税而鼓励投资是基于市场的决策，它可以减少低效投资和重复建设，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它也可以防止公共投资中出现



贪污腐败等问题，避免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

其次，提高家庭部门收入、鼓励消费是中国维持稳增长的核心。但在提高家庭部门收入占 GDP 比重的同时，保证企业部门稳定的利润率是关键。这意味着，政府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要适度降低，实现“还权于市场”和“藏富于民”。政府的主要职能应是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而其在经济和投资中的作用应尽量限制在市场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比如直接回报率低但对实体经济有正面溢出效应的部门)。即便在这些领域，政府也应通过减税或财政补贴的形式来提供支持，而不是作为直接投资

主体介入。

第三，减税可与产业结构转型相结合，如在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或服务行业方面给予更积极的税收减免政策。与此同时，在政府希望调控的行业，可通过税收杠杆(如环保税、能源税、房产税)的形式加以约束。

今年以来，中国政府在减税和鼓励民间投资方面做出了可喜的努力，如推广“营改增”试点、对小微企业的税收减免政策和“新 36 条例”的出台。但总体而言，仍需要改变政府以投资为主的思路，加大减税力度和鼓励私人部门投资，我们期待相关改革的步伐可以迈得更大、更快。（摘自《财经》）